

传世本《李密墓志铭》与出土《李密墓铭》的先后关系辨证

苏小华

摘要: 李密的墓志有传世本和出土本两种。一些学者认为出土的墓志铭是传世本的修改写定本。但是, 仔细审读两种墓志, 结合隋末唐初墓志作者魏征的处境, 可能两种墓志的关系恰恰相反, 即, 出土的墓志铭大约是根据传世本删改写刻而成的。

关键词: 李密墓志铭; 李密墓铭; 魏征; 隋书

中图分类号: K87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4-0043-03

1969年, 河南浚县城关公社罗庄西发现李密墓铭一块。1986年任思义先生在《中原文物》发表了此墓志的录文。^①1991年,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铭的图版。此后, 《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全唐文新编》都收录了此墓铭的录文(下文省称为“《墓铭》”)。与此墓铭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篇传世文献, 即辑录于《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中的《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下文省称为“《墓志铭》”)。对于这两种墓志为何有五百多字的差异, 整理者王兴亚、任思义有专门的讨论。他们认为: “其一、新发现的《李密墓铭》保留了魏征撰文的原貌。” “其二、文献里所辑的《墓志》铭文, 是流传于世的铭文。与上述刻石之铭比较, 可以看出它是修改以后的铭文。”^②在王、任二位先生的录文及其文章发表二十二年之后, 刘健明先生对王、任二位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 但是刘先生也认为《李密墓铭》是李密葬时魏征所撰写的原文, 传世的《李密墓志铭》为魏征后来改写之作。^③对于王兴亚、任思义以及刘健明先生的观点, 笔者本来是认可的, 但是在反复研究这两种铭文之后却倾向于认为传世的《李密墓志铭》为魏征原稿, 入葬之《李密墓铭》是修改定稿。其原因辨证如下:

修改文章必定有其原因。在文章中, 王兴亚、任思义两位先生和刘健明先生所给出的魏征修改文章的理由并不相同。

王、任二位先生给出的理由是: “我们疑为这些改动, 与唐朝的政治形势发展, 秦王李世民取得帝位有关, 也与魏征本人在唐朝地位变化有关。魏征在为李密撰墓志铭时, 官秘书丞, 地位不高。贞观二年, ‘迁秘书丞, 参与朝政’。后擢侍中, 地位显赫。卒于贞观十七年。是年, 《唐高祖实录》成书。由于唐朝政治形势和他本人地位的变化, 使他将原文中与秦王有关部分做了改动, 但又保留了李密想远游以避难而致祸的观点。”^④意思是说, 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 魏征为了避嫌改动了墓志。果如王、任二先生的观点, 出土之《墓铭》为未改本, 那么它的记事应该更清晰; 改动的《墓志铭》为了避嫌, 记事应该模糊。事实上, 恰恰相反。关于李密叛逃前后李世民的地位作用, 刘健明先生有个很好的梳理, 他说, “可见李渊在初一允许李密出发, 初二即委派李世民从后牵制李密。”^⑤根据刘健明先生的考订, 传世文献《李密墓志铭》所记之“俄属元帅秦王经营唐洛, 亦亲承密策, 帅卒先行”^⑥符合事实, 记事精确; 而出土墓志所记之“总出六戎。与元帅秦王东讨洛邑”, ^⑦记事较为模糊。详审两种墓志, 文辞确实不同, 但是从这两段文字很难看出改动前后的文字对李世民在李密被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叙写有质的区别, 因此魏征的确有修改以讨好李世民或者避讳的必要。假使魏征要避嫌就不应该出现“秦王”二字。因而以此作为论定传世本和出土本先后关系的依据似乎有点单薄。

①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②王兴亚, 任思义《李密墓铭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4期, 第104页。

③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 1998年, 第98页。

收稿日期: 2009-01-13

作者简介: 苏小华(1973-), 陕西岐山人。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北师大博士。研究方向: 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文献学。

④同注②

⑤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 第99页。

⑥《文苑英华》卷948, 第4989页。

⑦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 第110页。

刘健明先生认为传世文献为后改之文的理由是：“李密叛唐被杀，他（魏征）为李密撰写墓志铭，实在是一件为难的工作。李密墓志撰于李密死后不久，当时天下未定，群雄仍在逐鹿之时，说李密不满唐政府的薄待，当然不妥；说唐政府另下诏令导致李密有反叛之心，又不能明言；直言李密叛唐被杀，亦对墓主李密不敬。及至天下平定，魏征改写李密墓志铭时，更不便强调李密为何会有叛唐的行为。”^①据此原理，刘先生认为：“《墓铭》记李密在降唐时颇受重用，显然不如《墓志铭》可靠，正反映当时天下未定，唐政府薄待来降者对唐王室争夺天下会有负面影响，故《墓铭》要强调唐政府厚待李密；《墓志铭》撰于天下承平之世，不必再加强调。”^②刘先生以此来证明《墓志铭》是根据《墓铭》改写的。那么这里就有疑问：《墓志铭》是不是宣传品？如果不是，那么刘先生所担心的《墓志铭》会流传四方，以至于引起同时群雄疑忌的论证显然不妥。何况，李密被杀已经使群雄看到的李唐政府的薄情寡义，难道一篇墓志可以使李唐的形象改观？这是不可能的。据笔者的理解，说李唐政府对李密如何之好，恰恰是魏征说给李唐听的，而不是说给群雄听的，表明了徐世勣等李密旧部对于李唐的态度。如果说《墓志铭》的此段出于后来改写，也有令人难以置信之处。比如刘健明先生所引传世本《李密墓志铭》有这么几句话：“公威未振，主自为谋，盖当世旧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后来，或居其上。怀渔阳之愤愤，耻从绛灌为伍。负其智勇，颇不自安。”^③这一段文字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李密降唐之后所受的冷遇及其矛盾不安的心态，显示出撰写者对于李唐政府有不满之情。如果这是魏征后来改写之作，他是否有此胆量？笔者认为，受到李唐政府宠信的魏征不会如此卤莽（论证详下文）。刘健明先生又说，“李世民领兵从后出发，本有牵制李密的用意，魏征不能明言遣派李世民出兵的用意，只得说二人同往东讨洛阳”。^④刘先生的意思是，魏征在李密被杀后不能直言李世民曾经监视李密之事。那么，魏征在贞观时代就敢于写明吗？或者有必要写明吗？

根据以上分析，王、任、刘三位先生所认为的《墓志铭》为根据《墓志》改写一说，其立论依据站不住脚。既然《墓志铭》不是后来修改稿，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墓志铭》是原稿，《墓铭》是写定稿。

判断一件文献的年代，其内容如果能与有确切年代依据的其他文献有相印证之处，就可以以这种对应关系来确定这件文献的相对年代。很幸运的是，

流传至今的李密传记竟然有四种之多，加上《资治通鉴》，可以与两种李密墓志印证的文献共有五种。仔细比较出土之《墓铭》，它和《隋书》之李密传以及《北史》之李密传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较多。

《北史》隋代部分是根据《隋书》撰写的。笔者比勘了《隋书》与《北史》的李密传，发现《北史》李密传是《隋书》本传的缩写。^⑤所以，比较《隋书》李密传和《李密墓铭》相合的部分就可以了。《李密墓铭》和《隋书》相同的地方有四点：一、不记李密的字；二、不记李密的曾祖父李弼；三、不记李密与杨素父子的交往。引人注目的是这三点，传世的《墓志铭》与《隋书》不相同。而《李密墓志铭》这些部分都是有的。《隋书》李密传还有一点和出土《墓铭》相近，就是对李密归降唐朝之后历史的隐讳。

《隋书》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最为彻底，李密降唐后的历史不着一字。《北史》也是匆匆带过，写道，“寻奉使出关安抚，至熊州而叛逃，见杀。”^⑥可见在修史的贞观年间，对此事还是相当忌讳，因此无论是魏征还是李延寿都不敢触犯。《墓铭》记载李密降唐后所受的待遇很好，是“礼埒维城，荣加恒典，参二王之后，侧周公之胤，入居九列，出总六戎”。^⑦传世的《墓志铭》记载完全相反，就是上文所引的，“公威未振，主自为谋，盖当世旧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后来，或居其上。怀渔阳之愤愤，耻从绛灌为伍。负其智勇，颇不自安。”对于李密被杀的经过，《墓铭》没有实写，但是《墓志铭》就提到“短兵及接，修途已穷”，^⑧说明李密是被唐兵杀死。在赞语里面《墓铭》写作“陵阴迷路，尸乡殒身”用项羽和田横的典故，表达的很隐晦。^⑨《墓志铭》写作“熊耳迷路，新安殒身”是实写。^⑩这些事实说明，出土之《李密墓铭》对李密降唐以后的处理比较近似于《隋书》；传世之《李密墓志铭》对李密降唐以后的历史比较写实，与《隋书》的谨慎完全相反。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出土的《墓铭》在对李密降唐以后的境遇，在表达方式上和《隋书》接近，而传世的《墓志铭》与《隋书》的处理分寸有相当大的差距。《墓铭》刻成于武德二年，《隋书》修成于贞观十年，二者相隔十七年，经历了两个帝王。

⑤《隋书》卷70，第1624页。《北史》卷60，第2132-2137页。

⑥《北史》卷60，第2137页

⑦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第110页。笔者按：出土的《李密墓铭》有任思义《中原文物》本录文、王兴亚，任思义《郑州大学学报》本录文、《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录文、《全唐文新编》录文，笔者以为还是《中原文物》录文较为准确，故本文用此。

⑧《文苑英华》卷948，第4989页。

⑨《文苑英华》卷948，第4990页。

⑩《文苑英华》卷948，第4990页。

①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第98页。

②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第99页。

③《文苑英华》卷948，第4989页。

④刘健明《李密死事考析》，第99页。

这种情况说明了《墓铭》和《隋书》所代表的对李密的评价是初唐政府的定论。假使魏征在武德二年之后，贞观十四年之前，动过修改《李密墓志铭》的念头，那么他敢于违逆李唐政府的意图，修改成传世的《李密墓志铭》这种表达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不存在。那么传世的《李密墓志铭》只能是出土的《李密墓志铭》的原稿。

要论定传世的《李密墓志铭》是原稿，还有以下证据：

证据一：

墓志铭原稿一般不可能确定葬期以及应该刻入的与墓主关系密切的家属、亲友的姓名及其排名。这些都是家属或者主事者临时加入的内容。所以可以据此判断墓志铭文是否原稿。《李密墓志铭》有一段文字作：“粤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于黎阳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礼也。故吏徐世勣等或同婴世网”。同一段文字，《李密墓铭》作，“粤以武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子朔十六日乙卯葬于黎阳县之西南五里之平原。故吏上柱国使持节黎阳总管殷卫澶四州诸军事黎州刺史曹国公徐世绩、上柱国临河县开国公柳德义、上柱国阳武县开国公韦宝、上柱国闻喜县开国公杜才干等，或同婴世网”。^①两相比较，显然《李密墓铭》上年月日以及人物比《李密墓志铭》具体详密的多。可知《李密墓志铭》是原稿，《墓铭》是加入了具体的时间和人物的后来定稿。

证据二：

原稿的有些用词欠妥，定稿有所改动。比如：《墓志铭》有一句话是：“所恨并发唐代，不列元恺之功；俱为汉臣，独漏山河之誓”。《墓铭》改为，“并登尧世，不列元恺之功”。^②虽然“唐代”和“尧世”是同一意思，但是当时魏征作为唐朝的臣子，用“唐代”就有点不雅，所以改为“尧世”。如果《墓志铭》是后出，那么将“尧世”改为“唐代”，越改越糟，是不大可能的。

证据三：

魏征在写作原稿时，出于对故主的尊敬，墓志的主题是对李密的赞美，对李唐政府暗含不满。定稿对于李密的赞美有所减弱，对李唐政府的用词有所缓和。在描写李密战功时，《墓志铭》写作：“世充甚昆阳之败，炀帝同望夷之祸，化及师殁于黎阳，建德稽颡于河朔。七国之地，四为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③这些虽然是实写，但是李渊起兵初期，曾以李密为盟主。这么写，容易引起李唐政府的不

满。所以《墓铭》改为，“隋将王世充帅江淮之劲勇，驰幽并之骑射，鼓之洛纳，只轮无返；宇文化及尽百越之敢死，穷三秦之骁锐，剪之河坝，匹马不归。”^④经过删改之后，李密被定性为群雄之一，盟主的身份被掩盖了。又比如，《墓志铭》有一句作，“时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国黎阳总管曹国公徐世勣等收葬，有诏许焉。”《墓铭》作：“春秋卅七。诏公礼葬焉。”^⑤据新旧《唐书》，李密的收葬的确是出于徐世勣的请求。《墓铭》为了给李唐政府以面子改为，“诏公礼葬焉”，突出了李唐政府的主动地位。如果《墓志铭》是魏征后来改写，显然不可能把李唐政府从主动改为被动，而且前后重复没有必要。

证据四：

仓促之际，有些改写为求简练，显然不太妥当。传世本《李密墓志铭》比出土的《李密墓铭》多出五百多字。墓志容量有限，文字不宜过长，可以推测魏征写好之后，经过他本人或者其他人的删削。从文章整体来看，删削还是比较成功的，删削后的文章更加凝练。以文学水准衡量《墓铭》要好于原稿。以此看来，传世本不可能是魏征后来修改本。因为文章不可能越改越坏。另一方面，由于改写过程中过于强调简练，也有文意不太衔接的地方。比如，出土本“始开楚霸，终基汉皇”后面是“爵穷五等，位登九棘”。^⑥“始开”二句还是讲李密未降唐之前的事迹，紧接就是唐朝对李密的待遇，文意比较突兀。其实，传世本作，“始开楚霸，终基汉王。群雄并起，莫恢王度，圣人既作，皇天乃顾。爰自东方，言尊西路。来拟窦融，宠逾英布。爵穷五等，位登九棘”。^⑦传世本看起来是有点罗唆，但是文意是连贯的。假设传世之《李密墓志铭》是修改本，魏征觉得《墓铭》文意不通，要修改的话，只需要加入“爰自东方，言尊西路”文意就已经贯通，不需要其他词语，其他加入反而罗唆。作为颇有文学才华的魏征不会犯这种错误，所以说传世本不是后来修改本，反而是出土本由传世本删改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李密墓志铭》的传世本是原稿，出土本是在传世本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对于这个结论，笔者并不自信，作为一种推断提出，希望引起文史专家的注意，把这一问题彻底解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文就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英文信息转至第42页）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文苑英华》卷948，第4989页。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第111页。

②《文苑英华》卷948，第4989页。

③《文苑英华》卷948，第4989页。

④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第110页。

⑤《文苑英华》卷948，第4989页。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第110页。

⑥任思义《〈李密墓志铭〉及其历史价值》，第110页。

⑦《文苑英华》卷948，第4990页。

八尺也”的说法来进一步论证。

笔者按，从“寻”字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文字的字形分析来看，上引《小尔雅》及《说文》的说法当可信。

由此，我们把《引书》中的“如寻状”解释成像舒两肱的样子。

我们把这段《引书》翻译过来就是：悬前，低头，举双手抬头，像舒两肱的样子。摇肱，向前挥动两臂，像击掌的样子。

又前面说到的高大伦先生认为本条《引书》说的“摇肱”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的“鹞北（背）”可相比较。但是高先生认为“鹞北（背）”为“摇肱”之误释。我们说这可能不是误释，“鹞”本身指的就是比鹰小的猛禽。“鹞北（背）”当指鹞鹰背部翅膀煽动的形状。在张家山汉简《引书》中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华佗的“五禽戏”中大家

都可以找到古人模仿动物行为而创立的导引术的名称，如张家山汉简的“虎引”，马王堆汉墓帛书作“虎游”。华佗“五禽戏”中的“虎戏”分为“虎举”、“虎扑”二法。所以，“鹞北（背）”就是模仿鹞的一种导引术。而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题记“鹞北（背）”的那幅图正是一穿蓝衫长服之人，两臂左右伸出，作准备击掌的形状，和上引《引书》简文暗合。

可见“鹞北（背）”和“摇肱”应为同一引术动作的不同命名罢了。

以上说法为我们的猜测之论，提出来供方家批评指正。

① 详李先生的《续释“寻”字》一文，《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收入其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Four Notes on the Bamboo Slips of Qin and Han Dynasty

FANG Yong HOU Na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Boda College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ome views are described on Bamboo Slips of Qin Dynasty from Shuihudi and Guanju and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from Zhangjiashan. "Dingsha" means that the prisoners are tied to a rock and are crashed into the water. "Jimou" means asking someone to help getting marriage. "Xun" means stretching out one's arms. "Yi" means digging in the earth.

Key words: Dingsha; go between; digging; stretching out one's arms

(责任编辑: 刘兵)

(上接第45页)

The Dialectic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Kinds of Li Mi's Epitaph

SU Xiao-hua

(History and Cultural Institut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Li Mi's Epitaph, one has been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and another one is unearthed.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unearthed epitaph is the edition that modified the hand-down one. However, by reading over two versions of epigraphs and combining the author Wei Zheng's situation at the early years of Tang Dynasty, we believe that the unearthed Epitaph is approximately accomplished by revising and deleting the hand-down epitaph.

Key words: Li Mi's Epitaph; Li Mi's Inscription; Weizheng; SuiShu

(责任编辑: 黄云鹤)